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国际移民研究

——以安徽内陆新侨乡为例

汪 鲸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安徽; 田野调查; 场域理论; 国际移民; 移民研究; 新侨乡; 皮埃尔·布尔迪厄

摘 要】 论文介绍了场域理论, 并运用场域理论对中国内陆山区新侨乡的国际移民潮进行分析。通过对场域、资本和村民“习性”的研究, 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个体心理结构两方面来考察新移民活动, 为新侨乡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解读模式。笔者认为新移民场域内资本的流动和转换是推动国际移民潮出现和变化的关键因素。随着各种资本向内陆山区农村的转移, 新侨乡的范围和国际移民的数量将会继续扩大。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0) 02-0073-0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Field Theory: A Case Study on the New Qiaoxiang in Inland Anhui

WANG Jing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Anhui; fieldwork research; the Field Theo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studies; new Qiaoxiang; Pierre Bourdieu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It then employs this theory to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ve from the inland mountainous villages of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ield, capital, and the habitual practices of local villager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new migration activities from both the exter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ternal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thus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new Qiaoxiang.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flow and transfer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field of new migration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 rise and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ve. With the transfer of different social capitals to the inland mountainous villages, the scope of new Qiaoxiang will expand and the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will increase.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 出国成为一种热潮, 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移民群体。随着新移民数量和来源地的不断增多, 移民不再局限于沿

海或边疆省份的新老侨乡, 而是逐渐扩展到内陆山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安徽省黄山市 H 村村民就陆续移民至西欧和南欧, 且人数呈上升趋势。目前, 国内对新移民的研究已

收稿日期】 2009-11-16; **修回日期】** 2010-03-26

作者简介】 汪鲸 (1984—), 男,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如对浙江、福建、广东和云南等地侨乡从移民网络和社会资本等视角进行的分析,^[1]但对中部地区新移民和新侨乡的关注仍然较少。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笔者对黄山市H村的新移民现象进行了相关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对部分新移民和留守村民进行了访谈和调查。通过对H村材料的分析,本文试图考察内陆山区新移民的缘起和发展过程,并采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将内陆山区的跨国移民活动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通过对场域、资本和村民“习性”的研究,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个体心理结构两方面来考察新移民活动,为新侨乡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解读模式。

一 温州移民与新侨乡的兴起

黄山市位于皖南山区,具有内陆山区的地理特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H村在唐宋以来就是较兴盛的村落。至1984年,H村共有1275人、254户,其中温州籍村民约有640余人。H村共辖八个生产队,其中两个较大的生产队由本地的村民构成。其余的六个生产队中,温州籍村民均占各队人口的90%以上。据村民邱先生回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温州人口渐繁,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便有一些温州人到此处定居,后又吸引来不少温州亲友。新中国成立前后,仍有一些温州人来到H村工作并定居。在国际移民潮兴起前,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当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主要依赖稻米种植,体力和畜力是主要劳动力,生活水平较为低下。

H村中较早移民欧洲的是温州籍村民郑先生和胡先生两家。郑先生50岁(2009年),在家中排行老四。1974年,因为定居在意大利的大伯没有子嗣,需要从国内挑选子侄辈的亲属前去继承遗产,因此他得以移民意大利,此后一直在意大利经商,现在主要从事皮革生意和服装进出口贸易。现在,郑先生的大哥一家人、二哥的两个儿子、三弟的一个儿子、五弟夫妻二人和六弟一家都被接至欧洲。胡先生

的父亲早年曾前往意大利,从事推销皮包和领带等行当,新中国成立前回到中国,并于1955年迁到黄山市来。1979年,胡先生通过在荷兰经营餐饮业的姑姑前往欧洲,随后,三个弟弟也到了荷兰与西班牙,妹妹也跟随女婿前往西班牙。兄妹们刚开始都是在中餐馆打工,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都开设了中餐馆和商店。郑、胡两家通过与欧洲亲属的关系,分别以继承遗产和劳务输出的方式进入欧洲,在取得了合法居留权后,他们又将家人陆续接往欧洲。之后,为了扩大事业,他们又陆续将村中的亲属和朋友带到欧洲务工。据笔者的统计,H村里通过郑、胡两家关系而出国的村民有110多人。在H村中,郑、胡两家的移民路径是比较典型的跨国移民方式,这也成为之后很多H村村民进行移民所仿效的行为模式。

20世纪70年代是H村温州籍村民移民海外的初期,人数较少且途径单一(如继承财产)。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日益增多,人们大多通过家庭团聚和劳务输出途径前往欧洲。当时,部分欧洲国家允许具有合法身份的海外新移民申请家庭团聚,将父母(65岁以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接至移居国共同生活。但家庭团聚对移民身份的限制较为严格,因此,通过劳务输出前往欧洲的村民占了大多数。之前移往欧洲的新移民通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辛勤劳动,已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并开始经营自己的店面或企业。他们扩大生产时需要雇佣工人,而一般的欧洲劳动力又不愿意从事低工资低福利的工作。因此,急需劳动力的移民雇主们自然想到了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一方面,这些人沾亲带故,较为可靠;另一方面,这些工人的工资低且无需代缴高额保险费用,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当然,通过劳务输出前往欧洲的村民也有与雇主不存在亲属或朋友关系的。这些村民一般要在雇主的工场或商店中以低廉的工资工作几年,作为对雇主将其接往欧洲的报偿。

在H村较普遍的移民模式首先是接配偶和子女(具有享受家庭团聚政策的便利条件);其次是兄弟姐妹和父母;再次则是配偶方的家庭成员或是友邻。至2008年,H村共

有 500 余人移民欧洲。^① 这些海外新移民基本上是 20~50 岁之间的中青年劳动力, 主要分布在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国, 主要从事餐饮业、皮革业和服装鞋帽业等行业。现在, 全村只剩下 400 余人, 且多为中老年人, 20~50 岁之间的劳动力仅有十几人。^② 通过国际移民, H 村村民的生活日渐富足, 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在国外经商和务工的收入。据村干部估计, 2005 年, 全村的侨汇已将近 2000 万元。

温州人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开始前往欧洲从事商业活动,^[1]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 村中部分温州籍村民便依靠国外的亲友关系, 通过财产继承、家庭团聚或是劳务输出前往国外。在欧洲逐渐站稳脚跟后, 温州村民又开始运用各种办法将国内的亲友接至国外。这些温州籍村民成为跨国移民的先导群体。可以说, 温州籍村民是 H 村新侨乡产生并兴起的先决条件。

二 场域理论与新侨乡社会

西方学者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和理论颇多, 大致可按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进行划分。从宏观视角对跨国移民进行解释的理论有“推拉理论”和后续的“世界体系理论”。^[1] 这两种理论模型均从宏观的政治和经济层面来对国际移民进行解释, 但是难以解释移民现象中的个体抉择过程。从微观进行研究的有拉里·萨斯塔 (Larry Sjssatad) 和迈克尔·托达洛 (Michael Todaro) 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与奥迪·斯塔克 (Oded Stark) 和爱德华·泰勒 (J. Edward Taylor) 的新经济移民理论,^[1] 它们均着重探讨了造成移民行动的个体和心理因素。与上述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有所区别,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一直致力于弥合社会科学传统的客观—主观、个人—社会、有意识—无意识的二元对立分裂倾向, 试图创立一个可以解释社会经济结构与个人能动性间相互塑造与影响的理论体系。^[5]

布尔迪厄将行动者所处的环境看成是具有相对独立行动逻辑的场域, 是由内部不同位置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开放型结构: 场域中的

位置对应着不同的资本或权力; 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 (如对应、支配和服从关系) 就构成了动态性与开放性的场域, 而将场域内不同位置的行动者聚拢起来的是“资本”要素。布尔迪厄的“资本”将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予以扩大化 (包括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行动者的“幻象”, 即场域内的行动者接受了该资本是值得付出努力和智力去获得的, 从而对其产生某种信念。经由对特定“资本”的谋求和竞争, 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个体和群体被相互关联起来, 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的行动逻辑的场域。此外, 场域理论也非常关注场域中的个体抉择, 认为处于场域内不同位置的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行动者。这些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同时受到家庭出身、教育经历与独特成长道路的影响而具备一定的“习性” (habitus)。“习性”内化于行动者的身体, 在行动者的“习性”遭遇到其场域内熟悉的境遇时, 便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实践活动。场域内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或多或少都具备“资本”和“习性”, 他们既按照场域的具体逻辑来争夺“资本”, 又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创造和改变游戏规则。场域和行动者是相互形塑和影响的辩证关系。^[6] 场域—资本—习性概念三位一体, 成为观照具体生活实践的工具。^[7] 场域理论在承认结构的同时也关注到个人的能动性, 从整体上把握了个体行动与场域的互动关系。因此, 将 H 村跨国移民活动视为一个拥有具体行动逻辑的移民场域, 借用场域理论及其概念进行考察, 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跨国移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物理和关系边界的特殊场域, H 村移民场域具有与其他场域相异的行动逻辑和习性。在对 H 村干部与村民的访谈中, 笔者明显感受到村民对村务和村干部职务的关心程度较低, 对本地的各项行政事务兴趣

^① 由于部分村民是回到温州后, 再从温州前往欧洲的, 因此人数难以确切统计。

^② 据笔者 2007—2008 年期间的调查笔记所统计。

不大。村民间日常交流的话题主要是各种与移民有关的信息。2007年,笔者在村中访谈时,村民邱先生就对笔者说:前几天,朋友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说意大利的新总理普罗迪即将宣布大赦。当时,国内有关意大利的报道,很少有涉及意大利政府将如何对待外国移民的信息,可见,各种有关移民的信息在新侨乡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H村中,很多15~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都辍学随父母前往国外务工。因此,相对于临近的其他村而言,H村村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村中很少有青年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对于H村的大多数移民家庭来说,如果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那么最好初中毕业就将孩子送出国去打工。2007年11月时,村民王先生十六岁的孙子已经辍学在家半年多了,他去国外的入境手续已经办妥,由于国内签证还未办完,便在家中等待。当笔者问他为什么想出国时,他说“我不会念书,家里人就安排出国了。我们家在西班牙有很多亲戚。那些比我大一点的村里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初中毕业就出国了。”王先生也对笔者说道:“出国干得好的话,一年能挣十几万、几十万寄回来。在国内的话哪有能挣这么多钱的工作啊!”

由此可见,不同于以政治权力或是以受教育程度和知识为核心“资本”的政治场域或文化场域,在H村移民场域中,被村民承认和追逐的资本主要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组^①。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本在H村移民场域中缺席,而是相对于其他占据重要位置的资本而言,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移民的吸引力相对较弱。H村移民场域独特的行动逻辑主要是由不同个体和群体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追求和竞争所构成的。

温州人向外进行移民的传统由来已久。^[8]温州人长期进行移民活动的结果之一是,移民的行动模式已经成为该群体独特的“习性”。H村的温州籍村民群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凝聚力,其成长环境仍受温州传统文化结构和社会习俗的影响,形成了内在于个体身体和心理的行动倾向。作为一个迁居到此处的地缘和血

缘群体,温州籍村民群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了温州的方言、礼俗与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依靠这些象征符号和行为方式,他们不断构建与当地温州人群体、温州老家亲友和海外亲属的认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温州人跨国移民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可一旦环境改变,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父辈和祖辈出洋事迹的温州籍村民就通过各种途径与老家和国外的亲友取得联系,积极寻求重新向海外移民。布尔迪厄称“习性”为把被结构的结构变成具有结构功能的结构。^[9]温州籍村民就是凭借着已经内化的“习性”结构进行创新实践,不断推动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当H村的移民活动成为一种持续数十年,并成为村民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这种“习性”也逐渐被本地村民内化和共享,成为目前H村村民的共同心理结构之一。

受到村民追求和竞争的经济、社会和象征资本,在移民场域中的分布不是均质的,而是随场域内的不同位置而变化。移民场域内的不同位置主要由以下几类个体和群体构成:一是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早期主要是温州人,后逐渐有H村人加入)。相对于国内的亲友,他们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事业成功的象征和标志,他们也拥有象征资本。二是具有不同程度海外关系但身处国内的村民(主要由移居H村的温州人组成,也包括了与温州人有不同程度亲属关系的本地村民)。这些村民具有较少的经济资本,但凭借其海外的亲友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三是不具有海外关系的村民。这部分群体主要是本地村民和少数温州籍村民,他们具有较少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处于移民场域中的不利位置。他们大多通过资本间的转换来到达移民目的。

由于核心“资本”在移民场域中的不均

^① 本文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在温州和海外有较为牢靠的亲友关系,有较强的跨国移民能力;经济资本是指获得海外亲友的经济资助或是移民后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象征资本是指经由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而来的声望与社会地位。

衡分布，这就使得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和个人需要通过各种活动和策略获得资本。而活动和策略的结果就是导致资本在不同群体和个人间的分布发生了改变，整个移民场域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对移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目睹温州籍村民通过国际移民而获得成功后，一些本地村民开始积极寻求移民国外。截止到2008年，前往欧洲务工的本地村民共有89人。其中最早获得出国机会的就是与温州籍村民有姻亲关系的本地村民。在H村，温州籍海外新移民共有458人，已婚189人。^①本地的温州籍海外新移民群体中50岁以上的已婚者有60人，其中只有4人与本地村民成婚。这是因为在50岁以上的温州人中有很多是携带家眷来到H村的，即使当时来H村的时候是单身，由于刚进入一个陌生的乡村，语言不通，也很难与当地入结婚，而倾向于在温州籍村民中寻找配偶。而30~50岁年龄段的已婚者有90人，其中就有21人与本地人结婚。正是通过婚姻等关系，本地村民才获得了移民国外的社会资本，而随着移民行动的成功，原先为温州籍村民群体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本也开始流向本地村民群体。在本地村民中，较早移民海外并取得成功的本地村民王氏三兄弟，正是得益于与温州籍村民的亲属关系。起初，王先生通过与温州人的亲戚关系被带到欧洲。到欧洲之后，他又带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子女。随后，他将两个兄弟也带到欧洲协助自己经营餐馆和商店。王氏三兄弟在欧洲的事业发展非常顺利，这样，三兄弟又分别带走了各自在村中的亲属和姻亲。在村中，通过王氏三兄弟而出国的本地村民就有40多人。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本地村民群体通过联姻获得了原先主要为温州籍村民所掌握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越来越多的H村和周围村中的本地村民通过亲友关系得以移民海外，并逐渐形成了以本地村民为主体的新移民群体。与此同时，拥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温州籍村民，则通过帮助本地村民进行移民活动获得了自身的影响力和村民的尊敬，成功地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变为象征资本。

三 移民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中的资本间可以相互转换，各种资本存在着一定的“兑换率”。^[10]在H村移民场域中，除了可以清晰辨认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外，象征资本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布尔迪厄在对卡比尔（Kabyl）社会的研究中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布尔迪厄发现，当地社会中个体和团体之间的馈赠和礼物流动不仅仅是具体的实践行为，而且包含了承认对方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通过某种程度上对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否定和伪装，象征资本实施了自身的权力，以非压迫性的形象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和支持。通过从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换，社会等级秩序得以建立并获得人们的承认与服从。^[11]在新侨乡，象征资本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村民之间的“口碑”、捐款或是攀比式的建房产生的。村中对一个人能力和品行评价往往取决于他带出了多少亲属，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社会资本来帮助亲戚朋友进行移民。这种声望评价机制促使新移民与其他村民分享其社会和经济资本：从欧洲回乡的有一定条件的人很多会询问村中谁家比较穷，能联系出国的会尽可能提供帮助。新移民对象征资本的竞争也反映在他们对家乡的捐款和对家庭的侨汇上。据村民讲述，在1982年春节期间回乡探亲的胡先生光是给村中孩子的压岁钱就发了几万元，并拿出一万元给村中修路，又给生产队中的每户都送了钱。胡先生的富裕在村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比胡先生更早出国的郑先生也在村中捐资修建小学和为村民修建自来水设备。两人在移民后，一方面通过其经济和社会资本帮助亲友移民海外，另一方面通过对家乡和亲友的礼物馈赠而获得了象征资本，使得两家在村中的社会地位陡然提高，成为村民仰慕和竞相效仿的对象。

村民对象征资本的竞争还反映在各家的攀比式建房上。进入村中，各式洋房随处可见。据笔者调查，移民家庭每年收到的侨汇约在5~8万元人民币之间。几年下来，一个移民家

^① 据2008年村委会资料统计。

庭靠侨汇收入便可拥有几十万元的存款。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不高,而建洋房成为村民最大的开支。H村与外界的交通并不方便,不是较好的地产投资地点,而且国外的村民也难得回家,因此,空荡荡的洋房中大多是家中的老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村中建造洋房的数量日益增多且造价不断走高。很明显,建造洋房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其使用价值,已经成为村民竞相夸耀事业成功的符号。可以看出,在新侨乡的移民场域内,除了作为支配性资源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之外,对象征资本的竞争也成为促进和维持新侨乡国际移民场域的强大动力。新移民的这种“炫耀性消费”^[2]与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观察具有相似性。莫斯认为通过“夸富宴”上对财富和食物的大量消耗,“人群中、部落中、部落同盟中乃至族际间的政治地位也在其间得到了确定”。^[3]通过“炫耀性消费”,移民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开始向象征资本进行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了移民场域中个人与团体对象征资本的竞争,更展现了其希望通过此策略,谋求当地的社会地位和重新塑造社会等级秩序的目标。

除了大部分温州籍村民群体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换为象征资本外,H村的部分村民也在谋求将其他资本转换成移民必需的社会资本。在H村海外移民场域中,这种资本间的相互转换表现为那些无法获得海外关系的本地和温州籍村民群体为求移民而采取的各种策略和行动。缺少社会资本的村民不能通过家庭团聚和正规的劳务输出进行国际移民,他们大多选择通过非法移民形式或其他方式来达到目的。在H村,村民们并不避讳谈论偷渡。据村民介绍,现在偷渡去意大利或是西班牙这些南欧国家的费用约在12.5万元左右。其他检查较严格的如法国、比利时与荷兰等国,则需要根据路线、所需时间长短和危险程度来收取相应费用。温州籍村民黄先生就向笔者介绍了他的亲家通过偷渡出国的情况:1986年,黄先生的亲家经蛇头安排,先从国内来到南斯拉夫,后转至冰岛,再从冰岛前往荷兰,最后才抵达目的地西班牙。依靠着亲家的关系,现在

黄先生的两个子女都在西班牙经营中餐馆。本地村干部卢先生没有与温州籍移民的姻亲或是其他较为牢靠的关系,但是他作为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他通过将其两个儿子过继给村中的温州籍村民而将他们送至国外。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对过继亲属的检查并不严格,这样卢先生的两个儿子也就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合法来到欧洲。通过花钱偷渡或是政治权力而获得社会资本并得以移民的行动表明:在移民场域中,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身处移民场域中的群体和个体虽受“资本”结构的制约,但仍然具有依据环境变化而采取灵活策略的能动性。

四 结语

围绕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分配、占有和转换,海外亲友、温州籍村民和本地村民群体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通过个人和群体对各种核心资本的追求和取得,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移民场域。用场域理论解释新移民行动的优势在于:将环境、结构和个体能动性同时纳入了观察范围,通过移民个体对自身所占有的资源和规则的应用,揭示出整个移民场域和过程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路径。由于持续逾三十年的移民活动,温州籍村民所具有的移民“习性”已经成为大部分村民共享的心理结构,这是促使移民场域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的心理因素。虽然受到资本占有和场域位置的约束,但不同村民群体间的互动使得移民场域的资本配置逐渐发生了转变:温州籍村民的社会资本向象征资本转变,由外地移居者的身份向本地名人和权威转变;本地村民则通过婚姻关系、非法移民或是场域内各种资本之间的“兑换”,逐渐获得了本来所缺乏的移民社会资本。随着社会资本日益流向本地村民和本地人群,可以预计移民场域将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口,使得移民场域内的人群和关系更加复杂。

[注释]

[1] 如曾少聪:《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民族研

- 究》2003年第1期；王春光：《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李明欢：《“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王维、钱江：《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俞云平、王付兵：《福建侨乡的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高伟浓：《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等等。
- [2] [12] 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 [3]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 [4] Larry A. Sjaastad,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pp. 80-93, 转引自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
- [5]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谭立德译：《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 [6]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 [7] 张意：《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 [8] 王春光：《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44页。
- [9] [法] 皮耶·布赫迪厄著，宋伟航译：《实作理论纲要》，麦田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 [10] 张意：《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第133页。
- [11] [法] 皮耶·布赫迪厄著，宋伟航译：《实作理论纲要》，第109~122页。
- [13] [法] 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 书讯 ·

《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出版

马六甲郑和文化馆副馆长林孝胜先生的《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一书已于2010年1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该书为南洋大学学术论丛第二辑第四册。作者曾担任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副馆长、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以及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多年。

该书的文章大部分是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陆续在报章、学报或已绝版的专集上发表的，部分资料经修订、补充及更新。收录的文章分三种：华社、帮权、庙宇；人物、企业；口述历史、会馆特刊。三组文章有其连贯性，都以华社研究，尤其是帮权结构与运作为主轴。作者详细描绘了自19世纪至二战前夕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权结构和帮际互动的变迁。口述历史和会馆特刊皆为研究华社非常重要的资料，作者对会馆特刊和纪念特刊都有系统调查。书中几篇文章大幅运用了口述历史资料，非但使原来枯燥乏味的历史事迹变得生动，更重要的是让许多不见诸文献的资料得以流传，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甚至还纠正了某些文献资料的偏颇和不足。该书对研究近代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演变大有裨益。

（雷雨）